

DOI:10.16185/j.jxatu.edu.cn.2016.01.013

## 关学视野下于右任报刊文的创作思想<sup>\*</sup>

王 昊

(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21)

**摘 要:** 晚清时期报刊文大多凋敝,于右任先生陆续创办的四份报纸却为当时国民大众喜爱,特别是《民主报》曾创当时最大发行量。于右任自幼深受关学的影响,将关学的爱国精神、务实精神和道德实践精神融入其中,并发展为关注国运民命、呈现救国良策和重塑国民精神的报刊文创作思想,其中尤以关注国运民命为核心。这些创作思想与民主革命思想相互呼应,使得他所创作的报刊文具有独特的时代魅力,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

**关键词:** 关学;于右任;报刊文;创作思想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65(2016)01-0068-06

## Creation Ideas of Yu You-ren's Newspaper Writ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an Xue

WANG 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most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withered, but the four kinds of newspaper founded and sponsored successively by Yu Youren were popular with most people. Especially the Democrat once had the highest circulation. Deeply influenced by Guan Xue since his childhood, Yu Youren infused Guan Xue's basic spirits—patriotism, pragmatism and morality into his newspapers, which later developed into his ideas of creating newspapers—focusing on the fate of China, presenting good policies for saving China and reshaping the national spirit, with the concerns about the fate of China as the kernel. His idea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ideas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at that time, which added unique charm to his newspapers. His newspaper writings are considered as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Key words:** Guan Xue; Yu You-Ren; newspaper writings on papers; creation ideas

于右任先生是我国近代、现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并且是开创历史先河的民主革命报人。20 世纪初,于右任先生在上海先后创办四份报纸,分别是《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

报》,前后历时七年,这些报纸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他 84 岁寿诞日,台湾“邮政总局”曾特制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邮票,借此献礼,以表崇敬。收到赠送给他的这枚邮票的时候,

\* 收稿日期:2015-04-14

基金资助:陕西省社科基金(13J186);陕西省教育厅社科基金(14JK1321)

作者简介:王 昊(1979-),女,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E-mail:dulusf@163.com.

于右任先生动情地说道:“在我生活的历程当中,最使我难忘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尤其是当时的记者同仁,他们有的是壮烈殉国,有的是劳瘁而早逝,而他们英勇奋斗的精神,则始终照耀着我们的新闻天地”。

于右任报刊文充满积极为民生、积极为国家的态度,这与他自幼所受到的关学教育不无关系。他幼年曾受教于关学大家刘古愚、丁信夫、朱佛光,与吴宓、张继鸾并称为“关学余脉”。他用一生忠实地实践了关学所积极倡导的中国人的基本精神,那就是要对天地间整个人类负有使命与关爱之心,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报刊文创作与办报思想。

于右任报刊文,其创作思想可分为三部分,即关注国运民命、呈现救国良策和重塑国民精神,三部分紧密联系,互相交融。于右任报刊文创作形式可分为“论说型”和“新闻型”两种,表现出鲜明的“尊重受众”的办报理念。论说型报刊文长篇宏制,文言程度较深,具有雅化的特点,其阅读群体显然是知识分子;新闻型报刊文短小精悍,文言程度较浅,具有通俗的特点,既适合普通民众也适合知识分子,可以得而兼之,从数量上看新闻型的报刊文所占比重较大。两类报刊文都体现了于右任报刊文的创作思想。

## 1 关注国运民命

自张载始,关中学者都高举“为生民立命”的旗帜,始终坚持从关注百姓的角度去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其中激荡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这种爱国主义情愫深深激励着无数三秦儿女,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迸发出炽热的爱国情怀,这在于右任报刊文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的报人生涯与国运民命、匡时救世紧密联系在一起,代表着有识之士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sup>[1]</sup>的思想,时至今日在新闻事业中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从于右任创办报纸命名就可以看出他“民为邦本”的深沉爱国心、爱民心。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名为《神州日报》,用此报名“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sup>②</sup>。后三份报纸均以“民”名报,分别是《民呼报》、《民吁报》和《民立报》,史称“竖三

民”,旨在救国启民,向民呼吁,为民呼吁,期待百姓自立自强。于右任坚信只有民立,国才可立。于右任为四份报纸的命名,集中体现他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故在《〈民立报〉发刊词》上云:“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言论也,民权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sup>③</sup>。深刻诠释了民权、国立和言论自由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办报宗旨“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驱驰”<sup>[2]</sup>。办报目标“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民之叹息声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并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开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sup>④</sup>。

于右任以国运民命为关注点所写作的报刊文具有明显的政治传播属性,“政治在具体的社会和历史之中,政治传播的效应也要在社会历史中具体的呈现”<sup>[3]</sup>,这使得于右任的论说型报刊文聚焦攸关民生的国家大政,例如关于晚清的预备立宪的代表作《敬告希望政府之国民》,直指晚清预备立宪的核心机构——资政院和新内阁。他直言抨击资政院能力孱弱,无所作为“自今以往苟有持人民之名义以来恩吾朝廷之事者,必誓死以绝之”;内阁大臣更是“一则曰辅弼君上代付职责,再则曰用人行政承旨施行,此与今日之军机大臣口衔天宪以压倒一切者,会何以异一?”其职能与军机大臣本质无异,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使得预备立宪不过是“率全国之民以死于变相之专制而已”<sup>[2]</sup>,并且大声疾呼“诚恐吾民以希望政府之一念蹉跎生误,失此救国一瞬之机会,以重贻后悔于无穷也”,由表及里揭露晚清政府“假立宪真误国”的险恶用心。于右任在多篇论说性的报刊文中都明确指出晚清政府于民众背心离德,这一振聋发聩的言论与晚清改革派和革命派息息相关,两派争论的焦点就是晚清政府能不能通过改革脱胎换骨。于右任从第一份报纸开始就弃清帝纪年改用公元纪年,表明了他自己与清朝廷决裂的决然态度,寓意良深,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反清的态度越来越旗帜鲜明。于右任从以下三个方面击破了晚清改革派的迷梦,坚定不移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潮。

首先是立宪改革的本质。两派争论的焦点就是

立宪是否能让民众享有民主权利,增进福祉。于右任明确指出立宪不过是“国可亡,民可弃,而孤寡专制之政体用不可变易而已”,“新内阁之成立实将巩固旧有之专制政体,此后发政施用令更无复容汝民置喙之地”。还指出所谓立宪不过是巩固专制的虚幌,“其对于人民唯恐不能用专制之极致”,立宪不但无法力挽狂澜,反倒于民于国更添祸患,从而廓清了对于立宪的认识;其次,晚清政府内部派系争斗激烈,奸佞横行,完全置国脉民命于不顾。《京城归客之朝局谈》集中透析了晚清政局的三权鼎立,龌龊政争的黑幕,“今日之朝贵已成三权鼎立之势乎……要皆是不外此三权之竞争”。奸臣更是依附不同利益集团,肆意横行,谋取私利“独信一丧心病狂之盛某……则坐拥财政大权之某亲贵,挟无上之威力”;再次,晚清政府已沦为列强瓜分我中华之帮凶“今兹瓜分秘议之结果,显言之:则为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土地之象;微窥之,实即我残忍不道之政府与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四万万黄帝子孙生命财产之局也。呜呼,可不惧哉”。他从三个方面指出政府不可恃,“政府失之,人民得之……吾民于政府恩断义绝”,政府已经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上,成为出卖民众权益的刽子手。随着办报之日愈久,于右任鼓舞民众与政府决裂之心愈坚决,扩大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于右任关注国民权益的创作思想,在他的论说型报刊文中集中向知识分子透析晚清政局内部之腌臢,为苟存大肆卖国以结欢列强,立宪实为专制之变体,揭示了希冀通过政局改革挽救民族危亡无异于与虎谋皮,从而紧锣密鼓为民主革命造势。

在新闻型报刊文中,于右任深知民众智识贫弱,很容易受政府蒙蔽,故而言辞更为恳切尖锐:“自宪法大臣简派伦泽,而国民熙熙如登春台,其思也可怜”。“世界之风云日急一日,政府中日安乐一日,糊涂国民,欲托生民,财产于将来似是而非之宪法,真做梦也”。明确指出民众妄图通过宪政改革谋得民主权益,无异于痴人说梦,权利乃流血争取之产物,绝非已和民众背离心德之政府所愿赏赐。他的新闻型报刊文中警醒人心,“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人之心”。既有恶劣之政治环境的暴露,如《亡国三恶因》将灭顶之灾归结为“民穷财近”、“善不能举”、“外人窥

伺”,不作废言,直击要害,震人心魄;又有对政府及政客的抨击,如在《呜呼议员》、《伤心语》等系列新闻中,指斥国会、议员不过是门面功夫,救国无益;更有对艰难之生存环境的密切关注,如对满洲鼠疫的连续跟踪报道,如《鼠祸中之哀雁》、《北顾之伤心谭》、《追悼死者》诸篇,将民众之无助、政府之冷漠、医者之献身娓娓写出。其在《一哭》一文中写道:“自本报发刊以来,每日所载,连篇累纸,不外荒旱盗贼四字。”一语道尽百姓生存之凄惨。

## 2 呈现救国良策

“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实学精神,是关学700年来的优良学风。倡导“以反身实践为事,尝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关学的历代学者都广泛关注天文、兵法、医学等方面的知识,热衷探讨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普遍认为研习学理就是要通晓治国之道,有裨于国计民生,所以他们的学术注重与现实紧密结合,针砭时弊、陈献良策。于右任的报刊文创作也始终如此,正如他在《民立报》创始之初所说:“民立报出现于此时,亦当竭所知,以贡献之,使如此之大恐慌,不再见于上海”。

于右任论说型报刊文的救国良策集中在晚清经济和军事两方面,以三篇《救国论》为代表,其一为救经济,二、三为强军力。以军事为例,军事改革在晚清是热门的社会话题,但大抵言论都集中在如何使海陆军强大上,于右任却以日俄战争为例,俄败赔偿仅不过“割地不过桦太半岛,兵费未偿一文”,正是日本“畏其海军虽没,尚有强大之陆军在也”,提出了“即先停办海军,而专注其全力于陆军之扩张”的军事改革方案。接下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进一步说明“创办海军,第一财力不足是也……第二,外患不我待也”,故“综以上二理观之,欲救中国今日,则停办海军而专注全力以扩张陆军”。但仅仅专注全力扩充陆军,“军制不改,犹不可以为用也。军制何以改,曰:实行徽兵”,从而为《救国论(三)》论述军制改革张目。接下来于右任理清了历史上出现过的三个军制的内涵和外延,并比较得出了徽兵制度远胜于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志愿军制度,提出“分全国为二十六军区,设百镇,徽集而教练之,则三年以后,战时可得雄兵百余万”的具体做法,指出徽兵制度于中国有三利:“多额之军费可以

节省也”、“军国民之教育可以普及也”、“精锐敢死之军队可得也”。最后以陆军尚书于军制改革逡巡不前,号召早行徽兵制度。为了能够更好的找到救市面之良策,于右任还在报刊上发表《补救市面策之大悬赏》:“本馆同人念市面日坏,苦无救济之良法,以贡献于社会,特悬赏重金广征名论,其数目如下:(一)最优秀,百元;(二)优秀,四十元;(三)中等,十五元;(四)节采者,送本报一年”。体现了于右任试图将“媒介与人发生互动关系从而生成意义,重点强调的是媒介文本在文化与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sup>[2]</sup>的意图,继而最终实现“意义的共享”和“意义交集”<sup>[4]</sup>。

于右任论说型报刊文在救国良策分析上相当透辟,既有外强实例与经验的借鉴,又有对本国实情的深入分析,并灵活利用多种修辞手法,如对比手法使得徽兵制度之优立现,这种细密精致的辨析,丝丝入扣的论证,使得其文不但气势超拔,更以逻辑力服人,这也体现了关学“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于右任的救国良方是苦心得之,是学贵探索的体现,故在同类报刊文中鲜有可比。

他的论说型报刊文重在救国良策的条分缕析,以理服人。他的新闻型报刊文则重在革命行动的鼓动,号召民众不在口头不在头脑,而在行动。首先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共御外辱,这在满洲问题上表现得很突出。日本谋满洲日久,国中不肖之人竟然发出了“不如弃之”,于右任怒斥“中国人而作是言,非中国人也”,借少康复国“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复故国”,激励百姓誓死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体现了关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同心合力之精神;其次,于右任更多的鼓动民众投身民主革命浪潮,以自强求自立。他在《救国良策》中写道:“或问救国有奇策否?曰,无奇策也,只求通常可行而已。第一,鼓吹国民知爱国,人人做兵。第二无事不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第三,当知政府不可恃,试试勉求自立”。虽然于右任鼓动民众革命,借写《刺客经》赞“男儿复祖国之仇应如是”,赞赏了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壮举,但革命维艰不能盲目而为,如此不单是白白丧命,反令革命前途更加扑朔迷离,其《割鸡》、《人道麟角》、《温生财》等篇皆反思革命中的无谓牺牲,认为“革命党专寻着糊涂对头,也真奇怪”。生命珍贵,为国捐躯亦死得其所;他还提出如果青年人智识贫弱不堪救国,青年人应从充实自己入手,提升报国能力。于右任在《忠告青年》、

《学生暑假旅行说》中倡导“暑假之暇,旅行求实验之学问,上也”,鼓励学生以行促知,广博视野。

### 3 重塑国民精神

关学学者自张载都秉承着治学与做人并重的优良传统,弘扬道德,重视节操,倡导“仁心”、“善心”为“正己”、“正心”之本。在教育中,尤其突出学礼贵德,重视道德价值,始终坚持以德教为先的教育理念,“讲学即讲德”,砥砺气节,锻炼人格,继而高扬身体力行、躬行践履的道德实践精神。清贺瑞麟就说道:“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励廉耻,故有志圣贤之学者,大率以是为根本”。于右任汲取了关学这种“以德为本”、“以德为先”的关学思想宗旨,立下了“做天下第一等人,为天下第一等事”的鸿志,从而铸就了他高尚的道德品格和超群拔俗的气节。

于右任在报刊文创作中体现着很强的媒介教育理念,即“媒介能够实现其影响社会受众的良性功能”<sup>[5]</sup>,他希望通过所创作报刊文实现对国民精神的重塑。这首先表现在他对民主革命牺牲的喟然长叹和对以身殉道的深深感佩。于右任在为数不多的论说型报刊文中有两篇篇幅宏大、痛吊革命挚友的作品,分别是《吊杨笃生文》和《陶璜卿传》。文章叙写了两人民主革命心路历程,展现了民主革命事业艰苦卓绝的过程,歌颂了民主革命志士百折不挠的精神。行文色调哀婉凄绝,展示了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于右任和革命战友共同的人生经历,故虽是吊友,也渗透着他的生命体验。在新闻类报刊文中多篇赞美了满洲鼠疫中医生为疗救患者不幸染疫身亡的人道主义情怀。“此次满洲疫事,西医东医中医染疫而死者频闻,为道殉身,在死者本求其心之所安。在自吾人观之,致增无限之悲伤,同是人类,同有救人之天责,而此数十人独赴义,无黍为国伤乎民伤乎,可敬可哀,尤可感也”,高度赞扬了医务人员能够坚守本职,蹈死不惧的殉道精神。

于右任报刊文更多是对丧德失节卖国行为的奋力声讨。晚清亡国危机日甚一日,民众将目光集中于御外辱、保祖国两个方面,于右任就深刻指出“二三贪狡之夫,又欲乘时以恣为卖国之行……此其亡国之铁券”,认为汉奸之害甚于外辱,亡国不在于外,乃在内亡,正所谓“以百敌人谋于外,不敌一奸人输于内”,号召民众“拒外患杀汉奸,非吾民之责任谁之责任”。汉奸通敌暗中进行,官吏卖国则明

目张胆,中俄交涉,庆亲王、曹汝霖俨然是外辱谋我之内援,“必欲因缘一二盲小以为之援,而又整顿全神注定俄儿侵略之蓝本,唯恐一不得当,则将失其协约之效力,故凡可以制我死命之术,尽心力而为之,得失之机争此俄顷,此尽人所为之寒心也”,政府对卖国官员非但无降罚,却仍恩宠如故,“阿瞞之盘踞要津如故,身处嫌疑之地之枢臣,养尊处优如故”,而且还得清廷更多任用“政府以盛宣怀办路有功,请其办币制,办币制之事为已,又欲使其帮办盐政,东挡西杀,实在闹忙,吾恐不久又欲使其帮办醋政”何以如此,因为官吏卖国正“可以供政府日之挥霍,则虽斩尽我民命国脉以为殉”,卖国汉奸、官吏横行于世,幕后主谋就是卖国之政府,故于右任说“革命党者,不良政治下之产儿也”认为只有“罢虐民贼,杀卖国贼”方可救国.如果说清廷改革无效,救国无路,仍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完全沦为了洋人的朝廷,为求一时苟安,纵容官吏无耻卖国,上行下效,汉奸横行,德败身裂已然丧失了为政之根本,“人民与政府,无俱存之理”,于右任对于清廷败行的给予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这是导致致使中国残破凋零,民不堪重的根本原因,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民主革命浪潮的高涨.

于右任新闻型报刊文的重心绝不仅仅是通过暴露和批判来警醒人心,而是通过这些正视听的报道,以期改变民众冷漠、麻木、顺从等国民劣根性,引导国民建立起新的国民意识,他认同“教化明则学术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则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穷,人才众而天下有不久安长治者乎?此兴贤之要也”,显示出其高屋建瓴的思想境界,日后的民国变质也证明了国民性的改造对于国家命运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树立责任心,如果暴露和批判是以被动的方式向民众传播,那么责任心的建构则是促使民众变被动为主动去寻求救国良方,如《上海人之责任》,于右任在宪法问题上向民众大声疾呼“不可放弃最后之责任”,并指出唯有如此,才能“摧到旧日误国病民”.于右任对于浑浑噩噩无责任心之国民则痛斥怒骂“名士忧国,豪商忧市,独有几个贱男女,铁板琵琶,酣歌不已,闻之实在伤心,或曰此亦国民也”;其次是具备牺牲精神,以《爱国男儿》、《男儿须知》、《青年鑑》等系列文章为代表,鼓舞青年要艰苦意志,自强不息,时刻准备着为国牺牲.在《男儿须知(三)》中,作者从忧患入手“忧患者,英雄之

原料也”,呼吁青年“行止坐卧莫将祖国二字忘却”,希望青年“人生做事……不可无牺牲的精神”;最后是培养人道主义精神,这显然是对张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和合精神继承和发扬.在《西铭》开篇就讲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塞,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整个人类世界中,人人与我皆同生于这天地间,故而为同胞为兄弟,应该相互亲善和睦相处.这些激励着于右任在晚清民生艰难之时大呼人道主义精神,在《人道主义之纪元》中写道:“世界不灭,人类不灭,人道即不灭.故人道主义者,所以驱除不仁之虐者也”.并将这一精神推而广之,坚决反对辛亥革命中对无辜满族同胞的残害,补充和说明了孙中山“驱除鞑虏”内涵,正如其在《对满族之人道主义》中所言:“对于满族个人,宜主宽大,大兵到处,除诛戮抵抗者外,如有与其个人为仇者,记着必深恶而痛绝之.故保护其个人,更所以显吾族之文明”.

#### 4 结语

关学作为一个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征的学术流派,“蕴含的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品质,对关中人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sup>[6]</sup>,于右任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将它们注入到报刊文的创作中去,形成了关注国运民命、呈现救国良策和重塑国民精神的报刊文创作思想.其中关注国运民命是创作思想的核心,也是于右任政治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右任将关学传统精髓与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融合,并将之实践于报刊文创作之中,体现了他既立足传统,又与时俱进的现代创新精神,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正是这样的创新实践,使得其报刊文创作能够紧扣社会热点问题,这也体现了“既尊新闻价值,又尊重宣传规律;既考虑新闻价值,又考虑宣传价值;要尽力实现新闻与宣传的双重价值”<sup>[7]</sup>新闻规律.从而使得他对“三民主义”宣传较为全面深入,为民主革命推翻清廷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扩大了其传播和影响的范围,至《民立报》其影响远至内地各省及南洋,为建立新的国家体制,培育新国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于右任办报的时间只有七年,但其所创办的四份报刊和创作的报刊文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 注解:

- ① 许有成. 于右任传[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85.
- ② 傅德华. 于右任辛亥革命文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259.
- ③ 于右任先生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 于右任文集[M]. 台北:国史馆, 1978.
- ④ 李颀. 二曲集[M]. 陈俊民,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 ⑤ 赵尔巽.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清史稿[M]. 许凯标点.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9977.
- ⑥ 陈俊民, 徐兴海. 关学编·关学续编[Z].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⑦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中华书局, 1978:62.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 人民日报, 2013-08-21(1).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ublicity and Ideological Work[N]. People's Daily, 2013-08-21(1). (in Chinese)
- [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M]. Shanghai:Shanghai Triple Bookstore, 1998. (in Chinese)
- [3] 荆学民, 李海涛. 政治传播效应的机理与基本内核[J]. 现代传播, 2014(219):14.
- JING Xueming, LI Haitao. Mechanism and Basic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ffect[J]. Modern Communication, 2014(219):14. (in Chinese)
- [4] 斯图亚特·霍尔.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HALL S. 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 (in Chinese)
- [5] 姚君喜. 媒介批评:究竟批评什么——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论问题[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8(4):4.  
YAO Junxi. Media Criticism: What do Media Criticize—The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Media Criticism[J].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3, 38(4):4 (in Chinese)
- [6] 赵馥洁. 论关学的基本精神[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5(6):11.  
ZHAO Fujie. O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Guan School [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5, 35(6):11 (in Chinese)
- [7] 郑保卫, 陈玉. 论转变政风语境下新闻改革的目标追求[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3(2):74.  
ZHENG Baowei, CHEN Yu. The Aims of Journalism Refrom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ransforming Governmental Style[J].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43(2):74. (in Chinese)

(责任编辑、校对 白婕静)